



冯文潜：不应遗忘的哲学教育大家

陈鑫

冯文潜先生是20世纪中国一位哲学教育大家。作为学者,他被认为是“最好的西洋哲学史专家”,学识获同行赞赏和倚重。作为教师,他深得学生爱戴,在西南联大被誉为“对学生最为关心”的老师。作为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他规划布局、招揽人才,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为南开人文学科建设播下火种。可是他一生“甘为他人作嫁衣”,自己则述而不作,作风又极为低调,在他去世60多年后的今天,其贡献已很少有人能说清。重新梳理他的事迹,对理解老一辈学人的治学与为人,对思考今天的学术工作,都很有意义。

冯文潜自幼勤学,在南开中学读书时被同学称为“以脱博士”。“以脱”今天通译为“以太”,最早由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提出,20世纪初又成为时髦的科学名词;“博士”则与“学霸”同义。南开学生间喜欢互起外号,贴切、诙谐,表达的是亲昵之情。没想到的是,多年后的1946年1月,冯文潜在重庆沙坪坝机场送人时,突然身后有人拍他肩膀,呼唤“以脱博士”。回头看去,竟是当年低两届的校友周恩来!两人已近30年没见面,然而周恩来仍准确叫出这个外号,可见印象之深。或许是在同学们的鼓励下,冯文潜中学毕业后真的走上了哲学之路,留洋苦读,学成归国,1930年在张伯苓校长召唤下回到南开,终生服务教育事业。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南开与北大、清华被迫迁至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冯文潜与北大的汤用彤、清华的冯友兰共同主持哲学系。有学生回忆:“汤先生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又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留着一头浓黑的长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书包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先生瘦瘦小小,留着长到后脑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三位走在一起时,我们这些学生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

在联大,冯文潜讲授的课有“西方哲学史”“柏拉图哲学”“美学”“艺术论”等,每次课后他都把自己评价写到日记中,常见的如“勉强”“尚可”“不大满意”“顶糟了”。在战火纷飞中,还这样要求自己,不可不谓之严苛。可反过来,我们在很多学子回忆冯先生的文字中,读到的却是由衷感激。后来成为希腊哲学史专家的汪子嵩记述:“冯先生讲课非常认真负责,对每位哲学家的主要思想都讲得条理清楚,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由于课程受欢迎,常有外系学生来选修甚至旁听。冯文潜日记中有“见有三四旁听者”“窗内外听者十余人”等记录。中文系汪曾祺、物理系王景鹤、历史系何兆武等都曾听过他的课。何兆武回忆:“冯文潜先生教西方哲学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感觉到,真理解历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学的高度。”

对于有志从事研究的学生,冯文潜“手把手”指点。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全集》中文版主编的张世英曾说,冯文潜非常具体地教了他一套读经典的办法,“他要我每读完一节或一章,就合上书本,用自己的话把原文的大意写下来,个人的心得和评论写在另一旁”。后来张世英越来越觉得“从他那那里学得的知识最准确,最通透”。冯文潜还指导青年学人樊南星翻译名著《近代哲学的精神》。对于译稿,冯文潜并不动手修改,而是指出错误不当的地方,让译者自行改正,改得不合适,再改,直到满意为止。尽管花费了很多时间,还发生过争执,但樊南

星最终体会到冯文潜的深意。在译书的序中,他写道:“从冯先生那里我开始知道学术训练之严格,而他循循善诱的气度,居然使一个不大耐烦的人,低首下心地自责自悔。”

在学业上,冯文潜对学生严格要求,“报告是催得最紧的”。在生活中,他又是最爱护学生的,往往能站在青年的角度,去考虑他们的前途,也理解他们的爱国之情。学生们常到冯文潜家中谈心事和困难。当时学生们编写的《联大八年》一书,称冯文潜“待同学和蔼而庄严,使你有爱慕景仰之感”。直到毕业40多年后,学生顾寿观、汪子嵩说起“联大老师中哪一位对学生最为关心”,他们仍然共同认为是“冯柳筠(文潜)先生”。我们今天还能在冯文潜后人家中,看到一幅学生熊秉明临毕业时专门给老师画的速写。熊秉明后来成为一位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这幅速写正是师生情的见证。

自1941年起,冯文潜开始主持南开大学文学院工作。对南开大学人文学科的建设,冯文潜深感重任在肩。原来,南开建校之初就设有文史哲等专业,任教者不乏学术大师、青年才俊,但当时的南开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在国内忧外患不断的乱世中,办学资源紧张,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科不得不采取“集中精力政策”,收缩科系,主要聚焦到与国计民生关系更直接的经济学、政治学。然而南开人始终没有忘记基础人文学科的重要性。1942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期,南开着手为胜利后复校做准备,开始规划新的学科布局。冯文潜作为文学院院长,迅速进入角色,与同仁反复商讨,制订计划,他将此称作“为南大文学院作的小梦”。此后,他陆续招揽一批人才,如历史的杨志玖,哲学的王维诚、王逊,外文的卞之琳等。他还办起了此前南开一直没能建成的中文系,邀请彭仲铨、张清常、李广田等先生前来任教。

抗战期间,南开文学院最大的亮点是创办了边疆人文研究室。当时北大、清华都有自己的文科研究所;而南开三院中,商学有经济研究所,理学有应用化学研究所,都是赫赫有名的学术机构。对比下,冯文潜决心要办南开文科研究所。正好此时有一个契机,云南省决定修筑“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愿提供经费,委托学术单位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民俗、语言文化等。冯文潜与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抓住机会,发扬南开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创建边疆人文研究室,邀请社会学系教授陶云逵担任主任,主持学术工作。后来陶云逵不幸病逝,冯文潜就亲自主持,从日常事务到后勤保障,甚至编印刊物所用的纸张、油墨,他都亲自督办。对研究室的青年学者邢庆兰(即邢公畹)、黎国彬、高华年、黎宗献、赖才澄等,冯文潜更是关心呵护备至。在那样“虎狼当道,民不聊生”的情况下,研究室推出《边疆人文》专刊3集、综合期刊16期,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研究成果,成为联大学术亮点。

冯文潜担任南开文学院院长逾十年,艰苦创业,含辛茹苦,终于让师生感到文学院“颇有后来居上之意”。解放战争期间,冯文潜与同仁一道积极护校,保证了南开完整地留在天津,迎接新中国的成立。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高校都取消了二级学院,冯文潜由文学院院长转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冯文潜学贯中西,满腹经纶,但他一生精力主要用于培养学生、服务教育事业。现在要了解他的学术底蕴,只能参看为数不多的演讲记录和课程讲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

请来的顶骨舍利放置在一米多高的木塔内,供奉在大悲禅院的一间佛堂内。

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期间,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通过缅甸总理吴努向周恩来总理致意,恳切希望迎请玄奘大师的部分顶骨舍利到印度去。为了加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周总理征询各方面意见并由中国佛教协会征得天津分会的同意,决定将供奉在大悲禅院的玄奘顶骨舍利恭送给印度那烂陀寺。1956年10月,天津佛教协会派温悟等4位僧人将顶骨舍利护送到北京。转年由代表团送往印度。尼赫鲁总理在那烂陀寺召开有5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拜迎玄奘法师顶骨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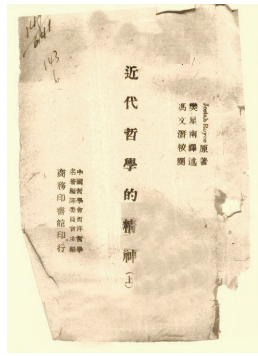
在天津大悲禅院,尽管玄奘的顶骨舍利不在了,佛教信徒一直把模拟塔代替顶骨舍利供奉参拜,遂在大悲殿东侧设玄奘法师纪念馆。玄奘法师纪念馆迎面供奉着高约2米的玄奘法师塑像,塑像前面的供桌上设一高约1.2米的莲座金塔,象征以往供奉玄奘顶骨舍利的史实和因缘。纪念馆有“玄奘法师生平业绩”“玄奘法师西行求法路线图”“玄奘法师译经年代表”“关于玄奘顶骨”等文字说明。同时陈列由玄奘主译的部分经论和典籍,珍存许多有关玄奘生平及其墓塔、顶骨舍利的照片,供人瞻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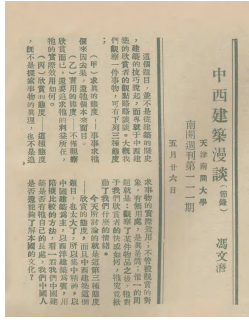
江南小镇(中国画) 姬俊尧



①《近代哲学的精神》(罗伊
斯原著,樊南星
译述,冯文潜校
阅)商务印书馆
1943年版封面。



①



②

②冯文潜演讲记录《中西建筑漫谈》(节录),刊于《中国学生》1931年第3期(转载自《南开大学周刊》)。

憾。但与此同时,又不由得让人佩服冯文潜无私奉献的学人本色。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汤用彤对学者使用的意见,特别提到“现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冯文潜先生不仅是一个最好的西洋哲学史专家,而且也是一个多年研究美学的专家”“应对这些老学者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了解,根据他们的特长分配一些任务”。面对仗义执言,冯文潜却深为遗憾,感到老友不理解自己。他表示,到图书馆工作是自己毛遂自荐的选择,图书馆是全校师生的知识库,教学、科研都需要从中汲取财富和营养。由于他懂得多国语言,又熟悉中国古籍和学术前沿,主持图书馆工作不久即得到馆内外的赞誉。1959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南开大学时专门来到老同学主持的图书馆参观,并邀请冯文潜夫妇等故友小聚,对他追求进步予以高度评价。

在阅读有关史料时,让人始终难以释怀的是冯文潜人生的最后一幕。1963年4月29日,已经病重的他坚持到图书馆办完自己所借图书的还书手续,到各办公室与同事们一一握手道别。而后他体力不支,被搀扶回家,转日即不幸辞世。直至去世,他仍然坚守着学人的光辉品格。我想,冯文潜的一生值得我们反复回味,以之为镜,涤荡自己内心的浮躁,思考学术的真谛,探索怎样才是真正合格的学人。

(作者系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合办
天津日报

学人小传

冯文潜(1896—1963),字柳塘,河北涿县人。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1917年至1928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先在中央大学任教,1930年起任教南开大学,历任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教授;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主任;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历史系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兼任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长,天津市社科联副主任委员,天津市政协委员等。曾讲授“西方哲学史”“美学”“柏拉图哲学”“逻辑”“德语”等课程,培养了一批研究人才。现存有“西方哲学史讲稿”及《中西建筑漫谈》《美与丑》《天才与创造》等美学演讲录。

满庭芳

第五三九三期

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十三)

玄奘的顶骨舍利

章用秀



2007年,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玄奘纪念馆(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在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那烂陀寺遗址附近修葺竣工。从玄奘法师西行印度取经至今已经过去了1300多年,他在印度留下的印迹依然清晰可见。在玄奘纪念馆的宝藏中,最令人瞩目与惊叹的是从中国迎来的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而这璀璨夺目的瑰宝来自天津大悲禅院。

玄奘(602—664)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位佛门骄子,也是值得纪念的一位伟大的旅行家、翻译家和佛教学者。他俗名陈祜,法名玄奘,唐代洛州缑氏(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缑氏镇陈河村)人,自幼“聪悟不群,备通经典,崇尚贤贵”。相传在他11岁时,随二兄长捷法师在洛阳净土寺出家。唐贞观元年(627)到了长安。贞观三年(629),27岁的玄奘由长安出发,西行取经,不避热风寒暑,排除万难,终于到达印度,在那烂陀寺从当时的佛学权威戒贤受学。经过17个寒暑,跋涉5万余里,于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携带大批梵文经卷,以及舍利、佛像等回到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在洛阳行宫里召见了。三月一日玄奘又返回长安。以后在长安弘福寺、大慈恩寺译经,所译经卷藏在大慈恩寺大雁塔。唐麟德元年(664)玄奘在长安玉华寺圆寂。

玄奘圆寂后,灵骨葬长安城外雁塔内。唐末墓塔毁于兵火;灵骨移至终南山寺。宋代将部分灵骨移到南京建塔供奉。后此塔被清军毁塌。1942年冬,日军在南京一遗址掘土施工时,意外发现掩埋已久的塔基,挖掘出供奉玄奘法师顶骨舍利的石函,石函上刻有宋僧邀请顶骨舍利的始末,内有铜函、银函、金函,层层套入。各函均贮有历代供奉的珍宝或钱币,金函中便是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这件事引起南京佛教界、文化界和新闻界广泛注意和高度重视。他们印制刊物进行宣传,披露于世,并刊出石函及墓塔遗物照片。在中国佛教界的交涉与监督下,日军将部分顶骨舍利运回日本,余下部分交还中国。1944年,部分玄奘顶骨舍利分送天津、北平、成都、广州等地供奉。天津的那份即供奉在大悲禅院。

为了迎请玄奘顶骨舍利,天津佛门弟子及信众提前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公推大悲禅院等慈方丈,龚心湛、靳云鹏等居士凡27人组成筹委会。1945年春,玄奘法师顶骨舍利由北平迎请至津。这天,天津火车站人山人海,市内红白杂货行业停业赞助,自愿义务供应餐轿一顶,并插饰数百件幢、幡、宝盖、旗帜等。大悲禅院举行了隆重的迎请仪式,进行了三天盛况空前的法会,朝拜参礼者川流不息。迎

如今,在公众场合穿着汉服已经是常见的现象,众多汉服爱好者充分显示出一颗颗深爱中华民族的炽热之心。但是,在汉服背后,我们要了解哪些文化?这正成为当代汉服发展的重要课题。

要展现汉服的文化底蕴和人文魅力,首先要了解中国文化。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离汉服并不远,应该多背诵一些。如果熟吟“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并知道这是曹植《洛神赋》之外的《美女篇》,那才有意境。汉服之美,首先来自中国的丝绸。白居易在《缭绫》诗里写汉服面料:“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仅这几句,就让我们沉浸在月光流水之间,一种好似神仙的感觉油然而生。朦胧中使人想到洛神,“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珥”。“罗”是极轻极薄的透孔丝织品,“华”在这里可指花纹,也可寓服饰华丽之意;“裾”则是衣裙的前襟和下摆。说着说着,仿佛在眼前浮现出一位古代女子的身影。倏忽间有如“风吹仙袂飘飏举,犹似霓裳羽衣舞”,杨贵妃在仙山绣阁小寐,听到君王差人来找她,急匆匆下楼来,竟会展现出那么美的效果。“袂”是袖子,只有丝绸衣裙的袖子才可以出现美术、音乐、舞蹈三合一的艺术叙事。

我在为一套从书写总序时,曾以诗句为题,即“月色如水水如天”,这里没有提到服装,但依稀能捕捉到服装的奥妙,准确说是中

汉服文化待研究



华梅



华民族服装的韵味。我还在我的“服饰文化学成果展”前言展牌上写道:“服装文化拥有那么多的美,既有‘橙黄橘绿’,又有‘落日熔金’,既有‘中庭月色’,更有‘无数杨花’。水清石出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意境在此间。”中国服装不同于西方服饰之处,不能仅停留在面料上。我们以丝绸为特色,西方以亚麻为特色。这只是材质因素。更大的区别在于,西方以服装来突出表现人的自然躯体,如女装露胸束腰扩臀,男装则突出表现下肢的肌体结构。中国服装则不然,穿在身上,无风时似一泓秋水,微风拂来便“天衣飞扬”。中国服装不显露躯干轮廓,相反是以衣遮体,“拥蔽全身”,却又在衣服的花纹上展示出古人对宇宙万物的思考。

据《周礼》记载,西周时中国已有完整的服装制度,而且24部正史如《清史稿》中,有10部史书专列了“舆服志”,其中对服装纹饰有明确规定,贯穿最高冕服的就有“十二章”,即礼服上的章纹,“章”是图案意。《尚书·益稷》中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绘绣这么多图案,有什么讲究呢?绣日、月、星辰取其照临;绣山形,取其稳重;绣龙形,取其应变;绣华虫(雉鸟),取其文丽;绣宗彝,取其忠孝;绣藻,取其洁净;绣火,取其光明;绣粉米(白米),取其滋养;绣黼(斧形),取其决断;绣黻(双兽相背形),取其明辨。

看,这就是中国服装,把中国人对天、地、人以及整个宇宙的理解与想象,都用图案的形式表现在服装上。

如今的汉服怎样穿?怎样才能通过汉服去表达中华民族的灵魂与根之所在?

汉服用于祭祀,应该是当代社会出现比较早的现象,祭黄帝轩辕大典,中国人无论从哪里赶到陵前,都要穿上最典型的右衽长袍。用传统的衣裳来包装黄帝子孙,以显示出一种神圣的崇敬和坚贞的忠诚,中华儿女坚不可摧,团结奔向前方。

当下穿汉服选颜色,大家都知中国红,这种颜色的汉服非常流行和普遍,实际上,中国古代讲究“四时服”“五时衣”,用于重大祭祀场合。即:春青、夏朱、季夏黄、秋白、冬黑。颜色的选用可不是小事,这里反映出中国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是尊重,“天人合一”不是迷信,正表现出人类的善意和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顺应自然,又拥抱自然,是我们祖先的理念根本。以服装颜色来达到与大自然的和谐一致,不正体现出共生的初衷吗?

当代汉服宽袍大袖或短褙长裾,有汉风有唐风,也有宋明典型遗韵,重要的是我们因此要深入了解其文化的厚度与广度。如此,才能将汉服的发展推向更高水平。

笔法,勾勒海河“因河而建,凭河而生,向海而荣”的发展轨迹。书中的四类人物命运交织:土生土长的老张,亲历从“三级跳坑”到宜居社区的变迁;国际设计师鲍尔,子承父志参与规划,与本土设计团队碰撞灵感;海归来云飞,因滨海新区规划而定居天津;规划师褚总与诸葛民,将半生心血写入城市肌理。他们的故事,不仅展现了天津中西合璧的城市特质,更彰显出因地制宜的规划智慧。

一河流淌 文脉悠长

——读《重回海河边》

郑祖元



年时将海河建成代表北方经济中心与国际港口大都市水平的中心景观带。随后,海河六大节点城市设计国际征集启动,56家境内外机构参与,42家外国公司带来全球智慧。几代规划人“衣带渐宽终不悔”,正如诸葛民所说:“来津三十载,半生心血皆融于此城。”

合上书页,思绪如河水奔涌。海河与天津相生相成,成为这座城的魂与脉。如果说经济是城市的血脉,那么清澈的海河不仅塑造了天津的容颜,更赋予它文化的灵魂。如今“海河申遗”的倡议,让这条河流再次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海河,这部流动的史诗应当被续写——申遗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向世界宣告:一条河如何从农耕文明的命脉、工业时代的引擎,蜕变为信息时代“诗意栖居”的载体。

当天津人“重回海河边”,我们所寻找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与城市血脉相连的文明根基。这正是“金龙起舞”后的点睛之笔,无论未来多远,其意义皆无可估量。

身为天津人,海河是刻在生命里的乡愁。每当漫步于河畔,看水波蜿蜒穿城,感怀岁月随潮起伏,仿佛无数光辉历史在波光间回响。天津的诞生、成长、繁荣与昌盛,都一笔一画写在这条沉默而丰饶的河流之中。古人言“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万千细流汇成浩荡之水,终成奔涌向海的大河。作为华北最大水系,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于此相拥交汇,共赴渤海。天津因河而兴,盐舟竞渡,百货辐辏,卫所巍然,铁骑难越。一条河,就是一座城的史诗。

《重回海河边》一书,由天津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朱雪梅主编,全面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海河综合开发改造计划。它如一幅长卷,细致呈现这场重塑城市空间的城市设计实践;也如一面明镜,映照出河流与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

全书分为三册。第一册《天津城市设计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系统梳理天津六百余年城市演进历程,分析各时期城市设计的作用,图文并茂、中英双语。其中“海河与天津卫”“金龙起舞”“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等章节尤为精彩。

“海河与天津卫”一章介绍了1930年《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近代天津首部全面规划,明确提出发挥港口与经济职能的方案,梁思成、张纪合作方案成为首选,城市主轴由两条林荫大道构成。1937年至1945年间,《天津都市计划大纲》更将塘沽纳入规划,为日后“一根扁担挑两头”的城市格局与“工业东移”战略奠定基础。

“金龙起舞”一章则从专业视角深入解析海河规划的源流脉络、两岸变迁与历史街区活化实践。既有真实的规划图纸,也含翔实的数据与案例。对专业人士,它是不可多得的参考;对普通读者,它是读懂城市的手册;对天津人,它更是一条唤醒记忆、连接未来的精神纽带——它告诉我们,海河的规划始终与世界同步,天津,生来就具备国际大都市的基因。

另外两册《天津城市设计的故事》(中、英文版)则以叙事